

论唐代骑射的重要性及社会意义

蔡童童

(长安大学 体育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唐代社会风气中尚武的传统源自于战国时期开始的军事模式变化,即以骑射为主的骑兵在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采取历史文献分析与考古实物印证相结合的方法,从骑射精锐是皇权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骑射是衡量男子体能与武艺的重要标准,骑猎是增强体魄、提高骑射技能的重要手段,骑射狩猎成为图像表现和纹样装饰的重要题材等方面,论述唐代骑射的社会风貌。研究认为,唐代前期,统治者重视武备,崇尚武功,骑马狩猎成为主流时尚,推动整个社会形成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阳刚之气,中央皇权也具有强大的掌控力量,连续开创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之治,唐王朝的综合国力达到了历史新高;唐玄宗天宝年间,国家武备逐渐荒废,社会风气由建功立业转为安逸享乐,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直至灭亡。

关键词:唐代;骑射;体能;武艺;骑马狩猎;李隆基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2)03-0094-07

On the importanc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mounted archery in Tang Dynasty

CAI Tongto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advocating martial spirit in Tang Dynasty society originated from the change of military pattern that began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at is, the dominance of cavalry in warfare, mainly by mounted archery. This paper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o discuss the social style of horseback riding and mounted archery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that mounted archery wa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imperial military power, mounted archery wa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men's physical ability and martial arts, horseback

收稿日期:2022-03-28

作者简介:蔡童童(1995-),男,陕西西安人,助教,体育学硕士。

riding and hunting w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physical fitness and improve mounted archery skills, and horseback riding and hunting became an important subject for pictorial expression and pattern decor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ruler attached importance to military preparations, advocated martial arts, and horseback riding and hunting became the mainstream fashion, which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an aggressive and vigorous masculine atmosphere in the whole society. In the meantime, the central imperial power also gained strong control, creating the rule of Emperors Zhenguan, Yonghui and Kaiyuan in succession leading to great prosperi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of the Tang Dynasty reached a new historical high. During the period of Tianbao of Emperor Xuanzong, the country's armament gradually fell into disuse, the social atmosphere changed from striving to build a successful career in the military to comfort and enjoyment, and the Tang Empire fell into a decline and an eventual end.

Key words: Tang Dynasty; mounted archery; physical ability; martial arts; horseback riding and hunting; LI Longji

“射”是用武器击中目标而非直接接触以取胜的一种较量方式,起源于远古时期人类的狩猎,发展到商周时期,“射”与礼仪相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用以展示和衡量技能、礼仪的“射艺”,所用武器也固定为弓与箭。在冷兵器时代早期,弓箭射手是兵阵重要的组成部分。战国时期,为了应对北方游牧民族骑着快马的突然袭击,赵武灵王进行了重大的军事改革: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1],以骑射之备来守卫国土。随着胡服骑射的逐渐影响以及骑兵在战争中的崛起,马术与射艺相结合的骑射,即骑在奔驰的马上张弓射箭的武艺,作为力量与速度、技能与装备的综合体现,成为军事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汉代击退匈奴,还是北方民族驰骋中原,都与其以骑射为主的军事实力有关。唐代,骑兵极为发达,对骑射的重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骑射在唐代社会居于怎样的地位?骑射对衡量、选拔武士有什么样的意义?唐代社会又是如何通过骑射来强健体魄、保持和提高战斗力的?为何骑马狩猎是唐代流行的图画和装饰题材?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来做一些分析、探讨。

一、骑射精锐是皇权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

在隋代,骑兵发达的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原政权的最大威胁,优良的马匹,快速、灵活、极具攻击力的马上刺杀、射击,是突厥军事力量的一大特点,要想取胜,必须要具备强于对手的实力,隋末在北方任职的唐代开国皇帝李渊深谙其道,他选拔善骑射的武士组建骑兵,以突厥“居处饮食随水草”的野外环境,模拟敌我双方进行围攻与突击的实战训练^[2]。李渊之子李世民,更是一位精通骑兵战的杰出军事家,在征战群雄、完成唐统一大业的过程中,李世民以优异的骑兵战术取得了薛举薛仁果父子、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的胜利,他也因才略出众“功殊今古”,被唐高祖李渊“特置天策上将军以拜焉,位在王公上”^[3],之后能以非长子身份登基皇位也与他卓越的马上骑射战功有关。

在巩固政权、保卫京城及皇宫的安全中,精于骑射的禁卫军更是唐代皇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开创北军守卫皇宫之例,其兵号“飞骑”;唐太宗还

强大的左右神策军,不仅是守卫京城精锐,甚至是皇帝直接掌控的一支野战军。

二、骑射是衡量男子体能与武艺的重要标准

早在西周时期,王室贵族就重武习射,以“射”作为“男子之事”来衡量其体能与武艺,甚至以射艺来选拔定度阶层等级:“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6]战国后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对抗北方的林胡、匈奴,骑射之风渐入北方地区。秦汉时期,随着骑兵的兴起,“善骑射”成为衡量男子体能与武艺的一个重要标准,如西汉李广因勇武善骑射,抗击匈奴有功,汉武帝时期,官至未央校尉、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1]。霍去病也因善骑射为骠骑大将军,在对匈奴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1]。汉末,董卓能搅动天下,也是因其“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7]。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8],涌现出一大批膂力过人、英武果敢、善于骑射的武将,如北魏起家时,为“代地之人”的古弼、乙瓌、周几、豆代田、陈建、来大千、陆真、尉元等等^[9],善骑射的骑兵是北魏强大且统一北方的重要因素。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习练骑射的尚武之风弥漫天下,骁勇过人,善于骑射尤其是“双带两鞬,左右驰射”,成为社会流行的对武士的最高赞美语,如北齐名将綦连猛,为代郡长大的武士,“梁使来聘,云有武艺求访北人,欲与相角。世宗遣猛就馆接之,双带两鞬,左右驰射,兼共试力挽强弓,梁人引弓两张,力皆三石,猛遂并取四张叠而挽之,过度,梁人嗟服之”^[10]。不仅男子,甚至还出现“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迭双”的神奇女子李波小妹^[11]。北朝时期,豪门大族骑射之风极其盛行^[12],这在《魏书》《北齐书》《北史》中有相当多的记载。西域高昌国,6世纪中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男子死后随葬的衣物疏中,随附弓箭的现象十分突出,显示出其地“便弓马好骑射”的社会风气,国家以骑射作为训练军民的基本内容,骑射成为男子必备之技能,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迁

亲自带领飞骑在殿内习练弓矢,又从中精选“材力骁健善骑射者”组成“百骑”^[4],不仅在突厥寇边时带着百骑与突厥可汗见面,以示震慑^[2],在外出狩猎时,亦使百骑扈从其左右^[4],百骑是比飞骑更加威武强悍也更得皇帝信任的近卫武士。龙朔二年(662),唐高宗将左右屯营独立出来改称为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将“百骑”扩大为“千骑”,中宗景龙元年(707)又改“千骑”为“万骑”^[3],景龙四年(710)李隆基以临淄王的身份联合太平公主等人,率领万骑攻入玄武门,诛灭了韦氏,他也因此功“拜殿中监,兼知内外闲厩、检校陇右群牧大使,押左右万骑”^[2],实际掌控了皇室的马匹供应及守卫皇宫的武装力量,为他进一步夺取皇帝之位铺平了道路。随后,以太子监国的李隆基又将左右万骑营从左右羽林军中独立出来,组建了左右龙武军,与左右羽林军平行并举,合称守卫天子的“北门四军”^[5]。从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家时的近身护卫到统一天下后的皇宫羽林,唐代前期的禁卫军,其主力都是精于骑射的将军、武士,机构的不断扩大亦反映出其对巩固封建皇权的重要性。

至德二年(757),唐肃宗选拔骑射高超的千名武士组成衙前射生军(亦称供奉射生官)^[2],即左右神武军,与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总号“北衙六军”。代宗李豫即位后,于宝应年间(762—763)以射生军进入禁中清难,故又赐其名“宝应功臣”;贞元二年(786),唐德宗又将殿前左右射生军改为左右神威军^[2]。加上天宝末年因安史之乱勤王有功,代宗时又护驾有功的神策军,唐代后期,守卫皇宫的北军“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2],虽然名称、机构多变,但均以善于骑射的将军武士为主。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左右神威总计“十军”,最盛时发展为约有数十万人的武装力量,因为守卫皇宫而被皇帝倚重。因此,在关乎皇权存亡的关键时刻,甚至是皇太子的立废更换中,常常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唐中宗的复唐,唐玄宗助力其父唐睿宗诛灭韦氏、稳固皇位,唐文宗的即位等。晚唐敬宗时的张韶之乱、文宗时的甘露之变等等,也都是靠左右神策军平息的^[2]。实力

徙的影响和军事防卫的实际需求^[13]。

唐代初期,延续了北朝以来的尚武传统,社会风气极其重视骑射,开创国基和有作为的皇帝,个个都是骑射高手。隋代大业十一年(615),时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的李渊率军袭击“龙门贼母端儿,射七十发皆中”^[2];武德二年(619),李世民与宋金刚大战,“以大羽箭射殪其骁将,贼骑乃退”,第二年李世民在率轻骑攻打王世充时,被重重包围陷入困境,又凭藉“左右驰射”实现了突围^[14]。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以“性英武,善骑射”而著称,年仅25岁就主管皇室马匹和守卫皇宫的左右万骑^[2]。大臣们也不例外,守卫皇宫重任的大将军,多是善骑射的忠臣,如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因“善骑射,喜驰猎”被提拔为官位三品的右卫将军,他也因体格强健而活到了90高寿^[2]。宰相姚崇,不仅政治才能卓越,且善于骑射,常与玄宗“偕马臂鹰”一同游猎^[15]。当时风气,为官者若不会骑射,则会遭到挖苦讽刺,如出身于江南的初唐宰相萧瑀,皇帝曾赐射,因“箭俱不着垛,一无所获”,被欧阳询写诗嘲笑:“急风吹缓箭,羽手驭强弓。”^[16]诗人张祜也在马背上写诗戏弄骑猎中“不知弧矢之能”的颜郎中:

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

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山狐兔当头行^[17]。

不仅男性,就连宫中女性,也跃跃欲试习练射艺,王建《宫词》中就有“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18],甚至还出现了飒爽英姿的野外骑射高手,如杜甫《哀江头》诗中有:“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中双飞翼。”^[18]骑射对男子都属于难度极大的技艺,但宫中四品、五品的才人,却将它实施得近乎完美,可见唐代主流风气对女性审美追求的影响。一直到晚唐,都有与皇帝并驾齐驱骑马射猎于野外的宫中嫔妃,如唐武宗“每畋苑中,才人必从,袍而骑,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与驰出入,观者莫知孰为帝也”^[2]。骑射的基础装备一个是马匹,一个是弓箭。马匹属于国家战略物资,唐王朝极为重视,通过朝贡、交换、互市、战争等方式,从北方和中亚一带获取良马,其规模之大、品种之多,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到唐高宗

麟德年间(664—665)时,全国马的数量已经达到70.6万匹^[4],创历史最高峰。唐玄宗时期,因其好骏马,仅御厩之马就有40万^[19];与此相适应,唐王朝也建立起一套由朝廷控制的、庞大而完善的马政管理系统,一来保证良马优先供给殿中省尚乘局,以满足皇帝为首的皇家用马需求,二来保证朝廷日常用马及国家军事用马。唐代,作为兵器的弓箭,完全由官方掌控,其制作由朝廷少府监下的弩坊署负责,“督其缮造,辨其粗良”^[20];管理则由卫尉寺下的武库署负责,“掌藏天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数以备国用”^[20]。守卫皇宫的武士,所配备的武器有弓矢、横刀,一般为弓一,箭三十,胡禄、横刀各一^[2]。这一点,我们在考古发现的唐代壁画及雕塑中都可以看到,如章怀太子墓壁画《仪卫图》^[21],一组守卫皇宫的武士,身体左侧佩带横刀、弓韬,右侧佩带胡禄;懿德太子墓出土的釉陶骑马武士俑^[22],也是左侧横刀、弓韬,右侧胡禄;杨思勖墓出土的石雕武士俑,则是弓二、胡禄一、横刀一^[23],可以满足“双带两鞬,左右驰射”。

唐代,善骑射的禁卫武士,最初多是元从兵或父子兵,即跟随皇帝打天下的将军武士及其子弟,如守卫玄武门的左右屯营。和平年代,禁卫武士则多从天下20岁以上的卫士中招募,条件是“勇夫壮士拔萃逸群”且“能骑而射者”,其身高要“先取长六尺(约1.84米),不足,即选取五尺九寸以上,灼然阔壮,膂力过人者”^[4]。除了身体强壮、膂力过人外,还要参加“射艺”的考核,具体项目有:“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即射程450米),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即射程345米),四发而二中;角张弩二百步(即射程300米),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即射程240米),四发而二中”,达到了方才视为合格。此外,还要“试弓马四次”^[2],即骑射要通过4次考核,成绩达到优异也就是必须精于骑射方可录取。虽然条件严苛,但一旦被选中,便免征赋役,身份地位随即大变,也为后续的升迁开启了一扇大门。

唐代,还在中国历史上首创“武举”考试,武则天长安二年(702),令天下诸州有练习武艺者,每年

准明经、进士例举送,第一次把武科放在了与明经、进士两科同等的地位。武举考试由兵部主管,考试内容有长垛、骑射、靶射、步射、平射、马枪、翘关(举重)、负重、身材等等^[2],除去身材这一天生条件,射技占比达到一半,射技中又以骑射难度最大。受此社会风气和考试制度的驱动,民间便形成了喜好运动、注重骑射的深厚基础。

三、骑猎是增强体魄、提高骑射技能的重要手段

初唐皇帝自知江山得来不易,因此始终不忘武备,牢记骑射的重要,一个有效且乐于接受的途径就是通过骑马狩猎来加强武艺训练,保持强健敏捷的体魄和高超的骑射技能。唐高祖即位后,就开始了频繁的野外骑猎,根据《新唐书·高祖本纪》统计,从武德二年到武德八年(619—625)的7年里,李渊每年都要到长安周边及大荔、富平一带的河滨、原上、山里骑猎,最多一年达到4次,足迹遍及渭滨、清水谷、甘谷、白鹿原、鸣犊原、骊山以及九峻山、北原、好畤、沙苑、华山等地,直至他去世前半年^[2]。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强调“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14],并将弓不虚发、箭不妄射的狩猎放在了与国家统一、国泰民安同等重要的位置,视其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

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4]

唐太宗在位总计23年,虽然政务极为繁忙,但也是经常外出狩猎,不仅长安城附近的昆明池、少陵塬、樊川、骊山,东到伊阙,西至岐山,也留下他骑马驰猎的足迹,虽然曾因“走马射帖,娱悦群臣”而受到大臣孙伏伽的劝谏^[2],但唐太宗不改初心,即使不便外出,也要率身边左右在后苑骑马射猎习练武艺,以此来保持骑射之功不废:“射猛兽于苑内,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发殪四豕。”^[15]唐太宗的弟弟巢王李元吉对骑猎痴迷至深,甚至

“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2]。长安城南“鄠、杜间有苍虎为患,天皇(指唐太宗)引骁雄千骑取之。虢王元凤,太宗之弟也,弯弓三十钧,一矢毙之”^[19]。打下江山的李氏父子,个个都是名不虚传的英雄豪杰。

唐玄宗在王位时,就常常“臂鹰戎服”,骑猎于长安城南的韦杜田野^[16]。即位之初,唐玄宗就在骊山脚下举行声势浩大的讲武礼,并亲自“体擐戎服,持大鎗,立于阵前”,发出“四方虽安,不可忘战”的号令^[4],随后在渭滨驰骋骑猎。唐玄宗还喜欢将弓箭赐给随从中的蕃客,让其“供奉左右”,他自己则在快马奔驰中迅速地搭弓射猎飞鸟,高超的武艺令身边的突厥使臣大为赞叹:“天可汗神武,天上则有,人世无也。”^[4]

唐代,不仅通过日常的以骑射为主的狩猎活动来锻炼体能、提高武艺、培养胆略与精神,还通过田狩这种大规模的礼仪性的狩猎,来全方位地训练将士指挥、调度以及协同作战的团队能力,融洽君臣上下级的关系,以提升整体战斗力,同时也以此来彰显大唐的军威和荣耀:“六飞驰骋,万骑腾跃”,“左右戎狄,并申勇敢。”^[4]

野外骑射狩猎惊险刺激,充满速度和力量感,不仅能强身健体提升武艺,获得巨大的成就感,还能纾解压力,愉悦精神,有助于心理健康,因此唐太宗将其视为人生乐事而痴迷其中。多才多艺、喜好游乐的唐玄宗,还在王位时就常常骑猎驰骋于城南韦杜之间,以致于常常“意乐忘返”^[16];当上皇帝之初,通过声势浩大的讲武来整肃军礼宣威国力,之后,还多次骑猎于渭川,展示个人高超的武艺和非凡的气概,同时,还能克制性地将骑猎的爱好和愉悦纳入礼仪的范围,比如有一次在咸宜宫游兴正浓准备外出骑猎时,听到大臣苏颋要出殡的消息,立即“怆然曰:‘苏颋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乎!’遂中路还宫”^[15]。

四、骑射狩猎成为图像表现和纹样装饰的重要题材

反映人类狩猎活动的图像在原始社会晚期的

岩画中就已经出现,随着胡服骑射带来的骑兵的兴起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尚武之风的影响,以马上骑射作为主要方式的狩猎活动,因兼有军事、体育、娱乐等多重性质而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流行,也因此成为图像表达和纹样装饰的重要题材,大量地出现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汉代,以图像表达呈现的地下王国里,骑马射猎和星象、神仙、车马出行、宴乐舞蹈等图像,一同构成了墓主人的精神信仰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理想场景,如西安理工大学考古工地发现的西汉壁画墓,M1 墓室东壁中部画有《狩猎图》^[24];在神木大保当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群,多座墓中有《狩猎图》,如 M23 的墓门门楣显要处的《狩猎图》^[25]。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其地域文化有着明显的西方和北方的影响,中原内地影响更是深厚,在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中,骑马射猎也是多见的內容,常常由一前一后两块砖组成,前者是马上骑射者,后者是被箭射中的虎、羊或野牛,如 M37 画像砖上的《狩猎图》^[26]。

北朝是北方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西魏第 249 窟窟顶北坡,有骑马狩猎图。北周京城长安的贵族墓葬,仍然延续装饰豪华的传统,在表现墓主人跌宕起伏、大富大贵的人生时,骑马狩猎依然是和出行、宴乐一样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和身份标志,如西安北郊炕底寨村发现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墓主为粟特人,官职为萨保,在其安身的围屏石榻上,采用雕刻、贴金彩绘的手法,极其奢华地表现了主人生前出行、狩猎、野宴商旅、宴饮乐舞、宾主相会等片段,右侧屏风《狩猎图》^[27],反映的是马上张弓射杀野兽的情景。西安北郊大明宫乡井上村发现的北周大象二年(580)史君墓,墓主亦为粟特人,官职为凉州萨保,在其安身的石堂(石葬具)上,雕刻极其丰富,有出生、狩猎、贸易、出行、宴饮、静思,也有死后经过神的审判升入天国的细节,石堂西壁《狩猎图》^[28],表现的是马上张弓射箭击中前方猎物的情景。最为精彩生动的是山西忻州九原岗北齐大墓,墓道东西壁以流畅、细腻的手法绘制出气势磅礴的《狩猎出行图》长卷,为中国迄今为止面积最大的地下狩猎图壁画,

从狩猎图中既可以看到北齐时期骑着骏马、带着弓箭的武士的风采,又可以看到骑射狩猎时的壮观场面^[29]。

唐代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注重现实主义表现的画家,创作了许多骑马狩猎题材的作品,如擅长画人物、鞍马的陈闳,画有《中宗射鹿图》《玄宗马射图》^[19],山水画家李思训画有《明皇游猎图》^[30],画马名家韩干画有《明皇射鹿图》^[31],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均未能流传至今。有幸的是,考古发现的唐代墓葬壁画,为我们保留下唐代贵族骑马狩猎的真实图像,如李寿墓壁画《狩猎图》,章怀太子墓(706)大型壁画《狩猎出行图》^[21],李邕墓(727)壁画《狩猎图》^[32]。从发现的唐代狩猎壁画分析,在为死者营造和还原的生活环境中,骑马狩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若壁画中没有表现,也常常用成组的骑马狩猎俑来弥补,如懿德太子墓(706)出土的绞胎骑射俑^[22],马上武士张弓搭箭反身射向飞鸟,写实手法同于壁画。唐代,即使是女性墓葬,也不乏成组成套且形象生动、制作精细的骑马狩猎俑,如永泰公主墓、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架鹰、携犬、带豹的彩绘狩猎俑,为人们了解唐代崇尚骑射、狩猎成风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

唐代,不仅用图像写实的方式描绘大型野外骑射狩猎的场景,用以表达对死者永久性的纪念,还在日常生活所用器皿上用骑射狩猎来作纹样装饰,以彰显和引导时尚潮流,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公元 8 世纪的狩猎纹印花绢片^[33],内容为武士骑马拉弓射狮,周围有猎犬逐兔、猎鹰追鸟,动感极强,且有浓郁的西方色彩。用骑射狩猎装饰最多的是唐代金银器,如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仕女狩猎纹银杯,杯身两两相间篆刻 4 组仕女游园和 4 组男子马上骑射的画面;狩猎纹高足银杯,杯身上面篆刻一组武士骑马奔驰、张弓射猎动物的纹饰^[34]。这种装饰有骑猎纹样的唐代高足银杯,大约发现有 30 余件,均作为主题纹样装饰在腹壁正中醒目处。皇宫贵族的宴席上,当人们举杯饮酒时,目之所及即是叱咤风云威武骑射的武士,可见骑猎在

贵族中间受欢迎的程度。

五、结语

唐代,由于统治者重视武备,使得骑射成为衡量武艺的重要标准;由于统治者的喜爱,骑马射猎成为一种主流时尚。唐代前期,整个社会洋溢着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阳刚之气,连续开创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之治,综合国力也达到了历史新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骑射、崇尚武功,上至皇帝王子,下到平民百姓,莫不如此,中央皇权也处于强大的掌控地位。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骄奢淫逸之风盛行,国家武备逐渐荒废,个人追求也由建功立业转为极度享乐,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大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直至最后灭亡。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3]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4] 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5]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 礼记正义[M].郑玄,注.孔颖达,正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 [7] 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8] 古诗笺[M].王士禛,选.闻人倓,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9]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11]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2] 唐长孺.读李波小妹歌论北朝大族骑射之风[J].北朝研究.1989(1):11-12.
- [13] 裴成国.论高昌国的骑射之风[J].西域研究,2016(1):1-12.
- [14] 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5] 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6] 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7] 范摅.云溪友议[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8] 曹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9]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 [20] 李隆基.大唐六典[M].李林甫,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 [21] 周天游.章怀太子墓壁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2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乾陵博物馆.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 [2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西汉壁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 [2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 [26] 戴春阳.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2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安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28] 杨军凯.北周史君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 [29] 张庆捷,张喜斌,李培林,等.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J].考古,2015(7):51-74.
- [30]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1] 宣和画谱[M].俞剑华注释.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 [3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 [33] 穆舜英.中国新疆古代艺术[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 [34] 侯宁彬,申秦雁.大唐遗宝 何家村窖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杨海挺)